

■新作聚焦

储福金长篇小说《直溪》:

乡镇中国的“问题域”及其展开形式

□晏东

储福金的长篇小说《直溪》讲述的是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类学研究者兼作家宋正明,因下乡挂职参与人口普查工作而深入乡镇并由此引发其关于人生意义“再思考”的成长故事。

《直溪》的艺术个性则更多体现在主人公内省的感觉经验中。换言之,《直溪》关于乡镇中国“问题域”的展开形式,本质上其实是以“心学”的方式展开的。《直溪》的总体风格因而是一种充斥着唯美的感觉经验的实验性文本。这种贴着行动主体的知觉、审美经验而展开的文学叙述,其艺术效果正体现出一种“双向性”:一方面,拥有多重身份下乡挂职的“干部”,因特定任务、扮演特定角色而作为行动主体参与、介入现实而揭示出一系列未及深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随着与主人公的见闻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乡镇中国渐次展开,感受、体验的主体同样借此找寻到某种安稳内心的归溯。就小说故事主体而言,《直溪》既是一个青年面对生命困境的救赎之路,也是回忆视角下业已成为“老者”的宋正明,对青年时代生命记忆的一种自我重构。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这是一部直面生活、直面内心、直面生命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通过生命经验的“回顾”而得以构筑的回忆视角,为小说叙事带出了一种双重的“看”的目光:彼时下乡参与人口普查工作的青年宋正明,正同业已退休的老年宋正明形成无声的对话。一方面,彼时“在场”的宋正明,其个人经历与感觉经验在与直溪的相遇中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主人公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展开回忆与叙述,又触发了这种感觉同现实问题之间的交锋。这种双重的“观看”,既为小说叙述的风格添加了一种“辩证性”意味,也生发出一种特殊的关于“真实”问题的观念:即对现实、对叙述的离间、警惕与怀疑。正如叙述者在小说题记中所强调的:“我曾挂职过金坛县/那里有一个直溪镇/与小说这儿的直溪/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声明本身即意味着,这里的小说叙事与所谓的生活纪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离间效果,事实是,任何叙述其实都是在重构某种现实关系。对文学创作而言,纪实性与虚构性一旦落到实处,即会削减其复杂性。而作为叙事者整理审美经验的叙事过程,它的组织、结构本身也携带着一种特定的视角或方法。这些在场的或不在场的形式、经验,共同构成了文学书写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它最终指向的目标,其实是写作本身的属性:虚构性。它的背后实际上延伸出的是叙事者对于“真实”问题的态度。正如小说借宋正明与林向英的眼光谈论小说叙事一样,叙述者在叙事过程中所保持的那种对于虚构的认识与目光,本质上连接着叙述者认识、理解真实问题的具体态度。对于《直溪》而言,这里的关键显然在于如何在整伤的语言叙述中,展开思想(带着记忆、感觉、经验的)主体同乡镇中国现实问题的沟通、对话。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直溪》会选择以主人公的反复、迟疑、焦虑的行动,反衬其对“历史与虚无”“梦境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微观与宏大”“存在与虚无”等思想命题的思考了。显然,这种选择本质的上传递的乃是作者直面现实复杂性的诚恳态度。

同样,如果对此有所熟悉,自然也就不难理解《直溪》为何选择从日常的细节着手逐步推进故事的情绪与节奏了。某种意义上,宋正明进入乡村开展人口普查工作,这一行动本身即与所谓人文为主的写作主旨紧密相关:随着个人经验的推展以及与此相关的系列事件的深入,那些行将被打开的问题、视域也得以呈现。这种探幽入微、深掘现实的目光,显然源于写作者特有的艺术自觉。就小说叙事而言,这一安排实际上也为小说叙事的有效推进提供了基本动力。在此,小说没有给出某种戏剧化的结构线索,而是任凭宋正明的工作进程、情感纠葛在与直溪经验的不断碰撞中展开、推进。除此之外,这种叙述显然也在揭示行动(思想)主体介入现实的位置与立场。小说依托这种“互鉴”的视点,重点呈现的乃是当代作家在新时代语境下观察、认识以及理解乡

■短评

房伟长篇小说《余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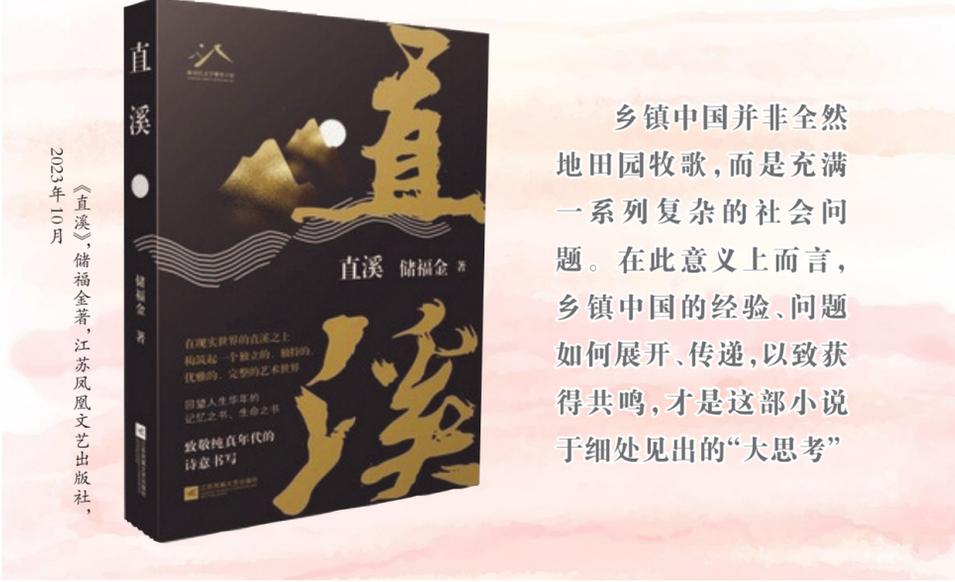
展现知识分子的学术初心与情怀

□吕佳泽

《余墨》是作家房伟“高校知识分子”系列小说的中篇新作。作品通过梁城大学知名教授容焕余及其弟子,展现了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深度勘探与透视了高校的学术生态、反思知识分子如何坚持学术理想,重建学术价值,回归学术初心。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大学教师不只要教好课,还要做好科研;不自己做,更要带领学生攀登科学的高峰;要实现研究成果的转化,形成产业化、社会化,即产学研的一体化。小说《余墨》的叙事实际也是环绕高校这种状况展开的,但作为人文科学,或许小说更切近人的自身,甚至更关注着人的精神与心灵,更能体现初心与情怀。史学家容焕余在历史学界及社会层面声名卓著,无疑也带领着出色的青年学术团队。弟子谷墨、程济、高晓非都是学界的佼佼者,他们同样在循着高层次祈望:获得项目、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他们孜孜以求、历尽艰辛、各显其能,都取得不菲的学术成就,他们的经历也是时下高校学术生态的生动写照。

谷墨、程济都才华横溢,有坚实的学术理想,在导师容焕余团队及麾下硕果累累,但他们或更认同以个人的才智及能力参与竞争。然而竞争是激烈的,这无疑也在不断放大学术的功利面。能力、竞争、功利的缠绕,也使学者们的学术目的变得多元化,从事学术研究的途径也更加多样化。导师容焕余功力深厚,学术造诣非常高,且守持崇高的学术理想。他坚持“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甘于寂寞,潜心学



镇中国的独特思路。从这一点来看,它与我们所熟知的革命时期的文学记忆中的艺术经验与叙事路线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如果说在周立波、丁玲、赵树理、柳青等作家笔下,进入乡村参与乡村的主人公更多彰显出一种由分散到整合的成长过程,那么《直溪》则更多呈现出主人公侧身的文明在乡村经验中的特殊性疏离感。这背后显然有后现代社会所赋予的思考语境,以及新时代主体理解乡村问题时所具有的特殊目光。

《直溪》因此建构的其实是宋正明在乡镇中国成长的心灵史。这种艺术思考不仅渗透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体现出对城乡文化(文明)差异的反思,同时这种直面内心的写作也使得叙事者的目光由具体的故事、情节而延伸至关于写作本身的思考。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整部小说在“讲故事”的意义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闭环:小说开篇写退休已久的宋正明被抽水马桶漏水的滴水声从梦中惊醒,宋正明因而需要修补、处理这一溢出日常状态的琐碎问题。及至结尾,小说的笔触再次回落到那个扰醒宋正明梦的滴水声。

在这里,老年宋正明正是经由现实中抽水马桶漏水这种“例外状态”(思想主体的感觉经验在“当下”语境下的停顿、闪回,也未尝不是与之相似的“一种”)而得以重返往昔的记忆,并通过写作(准确地说是“讲述”)完成了对这些片段记忆的整理与修补,进而实现一种关于自我价值的精神重构。一方面,故事的讲述时间所预示的当下、此刻,正与故事发生时间交叠在一起,完成了对片段化的生活碎片与零散叙事的艺术整合。另一方面,个体生命之于其精神困境的救赎之路也由此得以开启、完成。这种双重的“修补”或重构,构成了这部小说艺术结构中最为突出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宋正明进入直溪镇并不断遭遇经验“差异”而形成的一系列“异见”,既带有一种政治经济学(人口普查)的视野,也有关于伦理经验、个人情感的审美思考。如此一来,《直溪》所建构的“第二世界”便如同一个伦理经验的感性实体。它充当的其实是一个支撑性(江南)的文化、地理、思想的容器。而以人口普查的挂职干部的名义进入直溪

质和欲望,守住了学术良知,他们是学术的孤勇者,是学术研究实现良性发展的希望。第二类以程济和高晓非为代表,他们善于精致地规划自己的学术发展,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生长点,也善于利用各种学术资源与社会资源,重视团队合作,并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与学校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能以最有效快捷的方式获取学术成果,实现个人学术的发展。第三类以“我”(周丹)为代表,“我”是体制外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路数与学院派大不相同,对历史的研究和传播有独特的认知。前两类知识分子更多是坚守传统的文化信仰和学术规范,他们不善于将学术价值转化成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我”则活跃于传统与时代之间,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让历史介入时代生活。

《余墨》对历史研究及其学术价值的反思是深刻的。小说把容焕余及其弟子塑造成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是有深意的,实际上作家是以历史研究“镜像”,以探究当代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的价值何在?继而引发人们对学术研究相关问题的思考。小说体现了作家对个体生存尊严的关注和浓郁的人文关怀,也体现了作家对学术何为、学者何为问题的思考。学者既要有坚持探究本源、揭示本质、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也应有深深的学者情怀,观照现实,关怀人生,以人文引领和畅扬学术研究,如此才能回归学术初心、优化学术生态。(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关注

青年写作似乎被寄予厚望,一方面是对青年写作者带来崭新文学视野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常现基于既有文学经验的批评,比如青年写作中“历史感”的缺失。但是,这种趋于宏大的论述恰恰掩盖了青年作家千差万别的个体经验和审美取向。仅就吉林省的青年创作而言,“历史感”的缺失或许不能成为一个问题。

2023年7月,《作家》杂志推出“青年作者短篇小辑”,发表了翁珊的《立冬》,创作谈《伴唱》和许无恨的《黑山》与创作谈《逃出生死的记忆》。《立冬》在对父女微妙关系的讲述中轻柔地拂过家庭旧事,饱含不动声色的深情。小说始于一场离别,女儿鲍雪在清晨送父亲鲍志国前往机场。翁珊的笔调细致又缓慢,十分精巧地将母亲离世后父女的状态呈现出来。在对送别的漫长叙述里,二人始终没有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父女感情的淡漠,相反,在女儿买给父亲的耳机里,在父亲临行前悄悄的转账中,那种细心的体恤和欲言又止的微妙隔膜其实紧紧地连接起这对父女并支撑起整个小说的情感基调。小说中,鲍雪和鲍志国似乎对眼下的处境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和坦然面对的心境,作者没让两人陷入某种僵持的状态,反倒是在无声无息中添了一份相互的理解与体谅。《立冬》并没有提供多么曲折离奇的故事,反而在普通的生活流转中写出了个青年女性淡然又微妙的内心。母亲的离去在小说里成为一个隐藏的元点,那是时间对人生不可阻挡的打磨,但恰如翁珊在创作谈中所说,“冬日的严寒与荒芜却并不意味着下坠和消弭,相反,它赋予万物沉静跟勇气,庇佑着那些频频回头的人,在旷野中前行”。借此我们便可更好地体会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江雪》,它不仅为鲍雪这个名字的由来和母亲的期许,也是一个年轻人于回望中积蓄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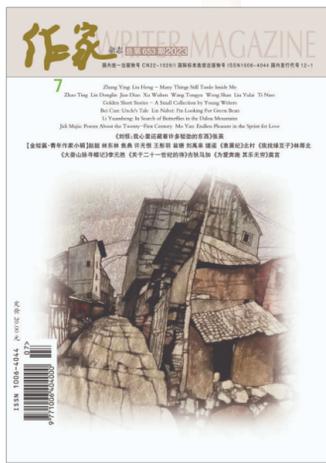
所谓成长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告别,无论《立冬》还是《黑山》,对旧时光的回顾都成为了小说的底色,但它们又不是单纯的怀旧,《立冬》把“完整的圆”作为一个前提,由此铺开的是从残缺走向完整的过程,《黑山》没有将童年视为珍宝,恰恰是那些不如意促成了今天的“奔跑”。两篇小说都没沉浸于时间消逝带来的感伤,它们在离别的沉寂中汲取养分,将往事打包装入行囊,或许它们都在质疑时间的力量,而这也正是青年独有的勇气。百余年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深山沃土塑造了人类意义上的东北,这充满艰险与自我救赎的过程亦生出道不尽的传奇往事。于小芙的《逆流而上》由“我”跟祖父上山认“干妈”引出一条祖辈们艰难漫长的迁徙之路。作者以传奇的笔致呈现了木把儿们进山伐木的场景,靠山吃山,全凭山林护佑,敬畏之中亦是听天由命。或许这里不应把祖父对山林的敬畏视作人与人的关系,它更多地指向了一种无法磨灭的生命历程,就像那张老黑白照片里祖父总是挂在嘴角的笑容,“母亲说,吃过大苦,遭过大罪的人就是这样”。小说在不同的时间里游走穿插,一时是“我”跟着祖父进山时他与山林的亲昵,一时是祖父跟着木帮伐木放排那彪悍凶狠又满足人情味的日子,一时又是“我”去寻访祖父的足迹和老护林员十几年间倾其所有将树栽满好些年头。《逆流而上》以有限的篇幅串联起有关山林的漫长时光,但它讲的不是山中草木,而是人的历史,是艰难岁月中人的迁徙、开拓和顽强的生命,也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和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小说有着很高的叙事密度和沉甸甸的情感,却在语言上又似散文诗般飘逸、轻柔。随着时间的变化,曾响彻号子和“顺山倒”的山林重新恢复了宁静,或许小说平静的语调亦是与一个时代作别和另一种生活开启的证明。

山林之外还有乡村,刘丽丹《灼人的七月》和杨逸的《野猪来了》则共同注视着乡村生活的人情冷暖。《灼人的七月》里的旺财是个“纯粹的农民”,谨慎务实,起早贪黑地辛勤劳作。他的身上几乎聚集了中原农民最典型的性格品质和生活习惯,当然他的初衷也很简单,就是要让全村人看到作为家中长子,“他是有出息的”。旺财的弟弟与他截然相反,没家庭,没积蓄,还蹲过监狱,离家30年后提着一只破皮箱住进了新房旁边的老屋。兄弟间的隔阂由来已久,父母对幼子的偏爱让弟弟始终高人一等,旺财至今还对弟弟在父母的袒护下夺走他割了一冬天架条买肉的手表耿耿于怀。母亲临终前把宅基地留给弟弟也让旺财心寒,而在弟弟归来后,这变成了无休止的麻烦。父母的偏爱让哥哥心生不平,母亲临终前哥哥听天由命的处置也让弟弟无法释怀。但是,故事结尾母牛发狂的危急时刻,作者还是让弟弟冲出来死死地按住牛角。在这巨大的转折中,是小说对朴素人伦和血浓于水的笃定,它的这种姿态甚至让人联想到于小芙的《逆流而上》,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极其严酷的环境中,下意识的出手相救或许就成了得以生存与延续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我并不认为《灼人的七月》是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宣告了兄弟二人的和解,也许内心斗争还会继续,但在接下来的生活里,兄弟俩无疑又多了一份底气。

《野猪来了》是个带有北方特色的脱贫致富的故事。小说带着东北特有的语言语调书写着东北乡村纷乱又致密的生活,它不但不以一个个归来者的目光审视着时光流转中的乡村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还借助隐秘的往事将其心绪收纳其中。而在一波三折的故事里,属于东北乡村的质朴和坚韧似乎又不断涤荡着归来者乃至读者的心灵。还有修瑞的《旧闻报道》,那是两代人寻找祖辈抗战历史的艰难历程;蒋冬梅的《大潮》是渔把头在查干湖冬捕时念起师父的教诲;戎禹的《夜筝》里有一个基层民警复员前的军旅岁月……吉林的青年作家们对白山黑水的历史和传奇生活有着难以磨灭的热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贴近并讲述着年轻一代对这片土地和让这片土地充满生机的人们的理解与想象,也带着浓郁的北方气质和质朴风格,展现了当代青年写作别具一格的文学追求。(作者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青年记忆与东北往事

□李振



乡镇中国并非全然地田园牧歌,而是充满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此意义上而言,乡镇中国的经验、问题如何展开、传递,以致获得共鸣,才是这部小说于细处见出的“大思考”

镇的宋正明,正同波德莱尔笔下“游逛”的街头叙事者一样(只不过宋正明有其目的性),在一步步打开这个“容器”的同时,使其呈现出一种潜在的对照性视角。这种对照性视角一方面是由宋正明这个“外来者”角色及其所携带的文化属性所确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小说叙述的结构安排有关。处在两个时间节点的宋正明,彼此互看、沉潜的感性经验,同样构成了小说最具内蕴的思想气质与艺术氛围。在《直溪》中,宋正明调查、整理人口数据的行动目标,以及于理性的目标之外的梦境中不断产生的呓语、断想,也使得这一文本兼具感性抒情与理性分析的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既是小说获得时代性、问题性的思想题旨,也是《直溪》以主人公的“回忆”建基的叙事,不断获得艺术驱动力的重要前提。

此外,在文学地理的意义上,小说同样打开了一种“内”与“外”相互关联的对照性视角。在这里,“内”自然指向的是直溪镇的内部经验、风物人情、环境生态。而“外”则指向一种经验的“例外”或是与直溪生态的隔膜,比如人口普查的“数字”,之于直溪人的经验的“外在感”。与此同时,那个在地理意义上的直溪以及这一实体性的空间内部无处安放的目标之外的梦境中不断产生的呓语、断想,也使得这一文本兼具感性抒情与理性分析的艺术特征。这种艺术特征,既是小说获得时代性、问题性的思想题旨,也是《直溪》以主人公的“回忆”建基的叙事,不断获得艺术驱动力的重要前提。

(作者系江苏作协青年评论家)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